

试析唐代河北地区的胡化

李治涛

(宁夏大学 教务处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唐代是中国封建化不断巩固的时期,然而在封建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河北地区却有一股胡化的潮流。隋末胡族的入侵,前唐东突厥的败亡与复兴,安史之乱之后形成河北藩镇集团是河北地区胡化的三个阶段。河北地区的胡化导致了两种文化的分野,事实上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央集团和河北藩镇两个集团,加速了唐朝走向覆亡的过程,对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河北地区 唐代 胡化 封建化

所谓胡化,它所指的是种族和文化的问题。陈寅恪先生认为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我国中古史的关键。“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关系较重而种族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1]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又有所补充和完善,他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区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2]也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胡种人进入河北地区,胡族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取得了优势,汉人受到边疆民族文化的熏陶与浸染,而脱离以长安为中心的进士文辞科的选拔,形成一独特的文化区域。

一、河北地区的范围与文化

本文所指的河北地区在唐代就是指河北道,即现在的京津冀以及鲁北地区。唐代在这里设有幽州、营州、魏州、博州、定州、深州、景州、德州等府州,也就是指西起太行山,东到渤海湾,北极大漠,东北与新罗接壤的广大地区。

历史上,这里曾仅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就是在东汉、曹魏、西晋这里也曾是文化甚高的区域,即就是南北朝的对峙时期,这里也是当时与左右历史潮流的江左文化、河西文化并驾齐驱的山东文化的所在地及影响的范围之内。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其衰退之相,为何在安史之乱之后转变为胡化地区,下面论述该地区胡化的历史进程。

二、河北地区胡化的历史进程

唐代,河北生活有突厥、高丽、回纥、奚、契丹等不同的民族,由于河北地区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以上诸多的民族进入河北地区是可以理解的。惟独中国东北、河朔之地有多数中亚胡人,比较难解,若他们远自西北内地万里之外短期之内忽然迁移至东北端滨海地方,恐不可能。这只能从旧史籍中去推论,从而把握胡化的进程。暂且把胡化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胡化的孕育期、发展期和兴盛期三个阶段。陈寅恪先生认为胡化即中亚胡人迁徙至东北一隅有三个因素:“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3]胡化的孕育期就是指隋代末乱之季少数民族乘机进入中原,此举为河北地区的胡化注入了因子,是胡化的发端时期。发展期指从唐初至开元年间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唐王朝内部突厥的衰亡与复兴而引起的大量的胡人进入河北地区,不断扩充了胡族队伍,为安史之乱做好了民众基础,而胡化的兴盛期则是指唐天宝年间开始的安史之乱及由此引起藩镇割据的后唐时期,藩镇割据是胡化的兴盛期,也是胡化的结果,本文将在胡化的后果和影响中进行论述。

1、隋末丧乱胡族的交侵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中央王朝统治崩溃,各地群雄并

起,而此时地处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由于突厥的兴盛而尽在其掌握之中,突厥乘中央王朝衰退、北方守备空虚之时,不断地渗入长城以内,而河北地区首当其冲。突厥的势力达到前所唯有的强盛境地,成为北方草原的统治民族。契丹、室韦、吐谷浑都是其治下的民族,突厥“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4]隋末割据的群雄如窦建德由于势单力薄,只好依附突厥,突厥势力之扩张由此可知。《旧唐书九三休璟传》曾云:授营府户曹,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诱扇奚、契丹侵略州县,其后奚、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于独护山,斩获甚众。超拜丰州司马。永淳中突厥围丰州,都督崔智辩战歿。朝议欲罢丰州,休璟上疏曰:“丰州控河遏贼,实为襟带,自秦汉以来,列为郡县,田畴良美,尤宜耕牧,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方得宁谧。今若废弃,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生,非国家之利。”朝廷从其言,丰州复存。

中亚羯胡必经由中国西北,而渐致东北。在隋末中国骚乱之世最为胡人逐渐转徙的天赐良机,而两唐书休璟传可以此事略露消息。由休璟传可知调露前后中国东北已有不少羯胡,而羯胡之迁徙实由隋季侵入西北,辗转东移,这与事实颇为合理。

2、前唐东突厥的败亡与复兴

唐朝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百废待兴,为了稳定民心,以求天下大治。唐朝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与少数民族和谐相处的民族政策,甚至不惜采取妥协的手段,取得国家的安宁。随着太宗皇帝内修文治、外强武功,国力逐渐强盛,便改变以前与突厥结盟的政策,打击突厥势力对境内的侵扰,而突厥此时内部纷争不已。自颉利可汗之后,突厥的势力逐渐走向衰弱。

“颉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来降者尚十余万,诏议所宜,咸言:‘突厥挠中国久,今天丧之,非慕义自归,请悉籍降俘,内充、豫闲处,使习耕织,百万之虏,可化为齐人,是中国有加户,而漠北遂空也。’”^[5]

太宗君臣经过商讨之后,“帝主彦博语,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祐、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割颉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入长安自籍者数千户。乃以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令率其下旧部。”^[6]

这样,迁徙大量的突厥旧部至河朔地区,而其中肯定含有大量的中亚胡人也迁徙到河朔地区,为这一地区又输入不少的胡人。唐朝政府的初衷是教化其民,让他们放弃游牧生活而过上农耕生活。但有些事情往往是与其初衷相背离的。

关于东突厥复兴,诸胡人入居河朔或归降中国之时代大抵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之世。而此三十年间中国东北即河

北胡族之活动其最有关大局者,莫过于东突厥之复兴,即骨咄禄、默啜兄弟武力之开拓远及中亚,夺取西突厥帝国之领地的现实。“骨咄禄者,颉利之疏属,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单于右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领,世袭吐屯噶。伏念既破,骨咄禄鸠集亡散,入总材山,聚为群盗,有众五千余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马甚多,渐致强盛,乃自立可汗,以其弟默啜为杀,咄悉匐为叶护。”^[7]

及至骨咄禄的力量壮大之后,他们便扩充实力,不时侵扰边塞,开拓边疆,势力远及中亚西突厥的广袤土地。这样,漠北通道又被打通,少数民族的迁徙更为方便。

骨咄禄死后,其子年幼,而不得立。默啜篡位,自立可汗。“默啜负胜轻中国,有骄志,大抵兵与颉利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藩悉往听令。复立咄悉匐为左察,骨咄禄之子为右察,皆统兵二万;子匐俱为小可汗,为两察上,典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号拓西可汗。”^[8]由以上记载我们可知东突厥确实经过复兴之后,控制了室韦、奚、契丹以至中亚西突厥的广大区域,而河北之地也在其侵略的范围之内,而河北经过交侵之后,在此生活的则有包括突厥在内的回纥、高丽、奚、契丹以及中亚羯胡的广大胡人,河北地区的胡化程度得到进一步的加深,实属无疑。通过内部的不断集聚,在河北地区则形成了一种与崇尚科举标榜文治截然不同的局面,那就是崇尚武力的胡化格局。这股潮流的膨胀,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三、河北地区胡化的原因

1、唐代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

有唐一代,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甚为灿烂。这是建立在唐代各代统治者励精图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之上的,以及胡汉融合的开放的民族大格局中形成的。唐代先祖有胡人血统,这里不做论述。唐代是继宇文泰的六镇民族创其大业的王朝。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宇文泰与杨隋的“关中本位”政策。他们不拘泥于形式,只是注重制度上的创新,并视胡汉为一家。周孔名教在唐代不断的发扬光大,科举制度的兴盛,弘扬了文治教化,大唐的气息传播到周边地区,唐代的律令制度也传播到日本、高丽。这种建立在自信基础之上的世界观,主导了比较开放的民族观。唐代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以试图怀柔化外之人,在对败亡的突厥的处理上,太宗皇帝曾与丞下讨论,彦博曰:“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彼创残之余,以穷归我,我援护之,收处内地,将教以礼法,取以耕农,又选酋良入宿卫,何患之恤?’”^[9]

2、唐代东守西进的国防政策

李唐王朝是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的政策而混一宇内的。唐代统治者在国防政策上采取重内轻外、东守西进的策略。所谓重内轻外,就是在京畿重地布有重兵,以拱卫首都的安全,应对外部敌人的进攻,而在边远地区则分兵驻守,形成重内轻外的局面。所谓东守西进,就是唐朝在西北进行积极开拓的进取政策,而对位于东北的河北地区则实行消极的保守政策。

唐朝面对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西北突厥、回鹘、吐蕃等民族。而河陇地区“其地域在吾国之西北隅,与西北诸外族衔接,历来不独为文化交通之孔道,亦为国防军事之要区。”^[10]河陇地区也是连接西域的要冲,西域自东汉以来,就在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成为中原经营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加强西域的军事力量,保持唐朝在西北的军事优势,是对吐蕃进行反限制的重要一环。加强西北国防力量,是维护京畿安全、巩固统治的基础。

相对于西北,河北地区在唐朝国防战略布局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唐朝试图在东北要有所为,但太宗对朝鲜的用兵则以失败而告终。高宗时,唐朝曾因朝鲜内乱而占有了新罗、百

济两地,但由于西边的吐蕃势力日益昌盛,迫于吐蕃的强大压力,高宗不得不撤出高丽。从此以后,唐室对于东北遂采取消极退守政策以维持现状。这样,周边的胡族势力集团在此聚集、不断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3、唐代周边民族的连环兴衰及其运动

唐代是我国中央王朝的兴盛时期,也是其周边民族剧烈运动的时期。“唐兴,蛮夷更盛衰,当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11]伴随唐朝兴衰的民族有突厥、回纥、吐蕃与南诏,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运动,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线的,而是多线的,在汉化运动之后,也有胡化运动。

四、河北地区胡化的后果及其影响

河北地区的胡化进程的加速,使得胡风尽染,汉风渐去,河北地区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崇尚武力、骁勇善战的民风。而安史之乱,则点燃了这把火。渔阳点起的烽火,很快燃烧到长安和洛阳,唐朝的历史进入了一个转折点。

安史降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或者是胡人,或者是胡化的汉人,前者属于种族问题,后者属于文化问题。但他们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骁勇善战、擅长骑射,这与以长安为中心注重进士文辞科的汉文化截然不同,分属两种不同的归宿。其中,李宝臣本属奚人,王廷凑属回纥人,李怀仙为柳城胡人,李正己为高丽人,这些藩镇其血统本为胡人,擅长骑射,性格善变,骁勇善战实属无疑。而田承嗣、李载义、刘仁恭则为汉人,但由于生活在河北这一胡风渐盛的地区,而逐渐不习礼仪。可见,社会风俗的改变,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本地汉人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这也是河北地区胡化的结果。

安史之乱被平定下去,朝廷为了拉拢安史降将,依旧委任降将出任节度使,节外生枝,形成了河北藩镇集团。“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维持长安为中心集团外,尚别有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文化亦为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周孔之名教科举之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12]

藩镇割据不仅对晚唐中央王朝的集权统治构成威胁,造成了事实上两个政权的局面,而且对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藩镇“乱人乘之,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胥相相依,以土地传子孙,协百姓,加锯其颈,利牾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13]造成了河北地区民族力量的变化,就是汉文化的影响减弱,而胡化的力量加强。北宋政权对幽云十六州的统一成为一种奢望,失去了巩固国防的前沿阵地,无形中削弱了它对北方民族的抵抗力。后来的辽金等骑马民族能够长驱之下,不时威胁宋朝的统治。可以说,河北地区的化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北宋失去了东北边防的屏障,造成了宋朝对抗少数民族政权的弱势地位,被迫签订澶渊之盟,形成了对北方政权俯首称臣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2][3][1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205.
- [4][5][6][8][9][11][1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6-6046.
- [7]刘昫.旧唐书:卷194[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67.
- [1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李治涛(1980—),男,宁夏隆德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